

我与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成立九十周年纪念文集

中华书局编辑部 编



中华书局

G 239.22-53

P

我与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编辑部 编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北京:中华书局,2002
ISBN 7-101-03344-X

I. 我… II. 中… III. 文史哲—文集 IV. Z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1288 号

责任编辑:祝安顺 马 燕

我与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编辑部 编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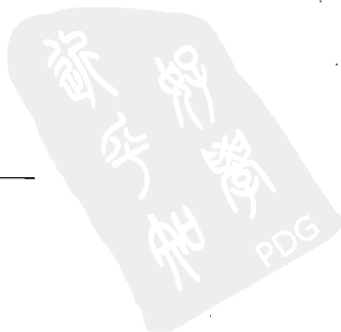
*

850×1168 毫米 1/32·13 印张·285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20.00 元

ISBN 7 - 101 - 03344 - X/K·1443



出版说明

为迎接中华书局 90 周年的到来,我们于 2001 年上半年在《光明日报》上刊登了“我与中华书局”征文启事,请各界人士就与中华书局有关的书、人、情、事撰写回忆文章。随后,又分别向学术界、教育界与中华书局联系密切的知名人士和本局的离退休人员发出约稿函。到目前为止,共收到稿子百余件,我们从中挑选 62 篇结集出版,作为 90 周年局庆的纪念图书。

90 年了,有多少往事从记忆中不经意地消失,但当我们发出征文启事和约稿函时,许多有心人纷纷打开记忆的闸门,写下沉淀在他们脑海中的往事,留下作者、读者和编者之间一幕幕感人的情景。令人欣慰的是,深刻的印象、浓郁的情怀毕竟没有随岁月而消逝,只要轻轻触动,就文思泉涌,扣人心弦。

本书收录的文章大致分为四类:一、专家学者与中华书局的密切交往;二、作者与中华版图书的文字因缘;三、

一般读者与中华书局的书缘；四、怀念逝去的中华书局同仁。此外，我们还把有关中华书局历史和出版成就的5篇文章做为附录。这些文章，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作者对中华书局的厚爱和肯定，这种肯定体现在具体的书、人、情、事之中，特别是对解放后中华书局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深情的回忆。那么多的事，那么深的情，让我们久久难以忘怀。

当然，在激动之余，我们心中的感慨是颇多的：很多的中华书局人已离我们而去，但他们仍活在众多读者和作者心中；好多的书历久弥新，有的已有新版，但原版的影响至今犹存。薪尽火传，传承中华文明之火，那是众多厚爱中华书局人士的一致期望。愿我们与作者、读者之间在90年里形成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我们将用辛勤的劳动和加倍的努力回报各方对我们的厚爱！

在本书征稿和成集的过程中，得到了局内多位编辑如刘尚荣、柴剑虹、李解民、骈宇騫、胡友鸣、李肇翔的大力支持，沈锡麟在编排上做了许多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另外要说明的是，我们从来稿中已选了12篇在《光明日报》上专栏登出，另有十几篇在《文史知识》、《书品》上发表。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2年4月1日

目 录

- 我与中华书局 张岱年 (1)
- 我与中华书局之间的奇缘 王树民 (3)
- 我与中华书局的深情厚谊 吴小如 (6)
- 我与中华书局 王永兴 (10)
- 我与中华书局有缘 王运熙 (18)
- 我与中华书局 李 侃 (22)
- 我爱中华 戴文葆 (58)
- 未了中华情 章开沅 (62)
- 我与中华书局的友谊和学谊 徐莘芳 (65)
- 难忘的往事 汤志钧 (68)
- 衷心的感谢 曹道衡 (71)
- 我与中华书局的人和事 来新夏 (75)
- 我与中华书局交往的四十年 安作璋 (81)
- 印象中的中华书局 蔡义江 (87)

一以贯之地培养作者

- 一面,一指,一种杂志 白化文 (91)
- 罗尔纲与中华书局 罗文起 (97)
- 绵延人书情 吕 坚 (103)
- 母亲的“中华”情结 贺龄华 (107)
- 扶掖 鼓舞 推动
- 我与中华书局的书缘 方立天 (110)
- 中华书局与我的学术生命 张立文 (115)
- 琐事难忘 瞿林东 (119)
- 中华书局:我永远的“老师” 祝尚书 (124)
- 我与中华书局 李裕民 (129)
- 亦师亦友 学海同舟 陈祖武 (134)
- 何当共剪西窗烛 王春瑜 (137)
- 我和中华书局一起获奖 张涌泉 (141)
- 学高身正 吾人风范 孙 虹 (145)
- 启功先生推荐我到中华书局当编辑 柴剑虹 (148)

热心扶持 终生难忘

- 回忆《欧阳修资料汇编》的出版经过 … 洪本健 (152)
- 《苏轼诗集》校勘工作琐忆 孔凡礼 (156)
- 我和中华书局因陆游结缘 孔凡礼 (160)
- 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回归记
- 我与中华书局的一段因缘 冯其庸 (165)
- 心中始终装着作者读者 裴汝诚 (184)
- 我与《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的文字因缘 周勳初 (189)

- 我和《学林漫录》 黄永年 (196)
- 《万历十五年》在中华书局的出版 傅璇琮 (200)
- 编校《海瑞集》追记 程毅中 (212)
- 容庚先生与《金文编》 赵 诚 (221)
-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缘起
- 和《元史》点校 姚景安 (231)
- 我与中华书局编辑的一些交往 王曾瑜 (240)
- 略述中华书局在出版清代
- 档案史料方面的重大贡献 朱金甫 (242)
- 中华书局与近二十年的孙中山研究 林家有 (248)
- 亲近中华书局 胡经之 (255)
- 认真 执著 敬业 德人
- 一位作者心目中的中华书局 谢俊美 (260)
- 美好的回忆 牟钟鉴 (267)
- 写作需要鼓励
- 与《文史知识》同行 宁宗一 (270)
- 我仍怀念《小朋友》 刘保康 (276)
- 愿中华传统常青 赵之茵 (278)
- 中华书局与我的六十年 朱 麟 (280)
- 追慕中华无已时 杨 忠 (282)
- 读中华之书 扬中华文明 冯宝君 (287)
- 结缘“中华”四十年 赵丛书 (292)
- 情系中华 感谢中华 黄锡榴 (296)

史笔如椽标千古 十载沉沉太史冤

- 回忆吴晗先生 张习孔 (300)
- 怀念金灿然同志 郭预衡 (312)
- “平生佩服金灿然!” 胡宜柔 (314)
- 怀念金兆梓、傅振伦、王仲萃三位先生 洪廷彦 (323)
- 怀念赵守俨先生对我的关爱 张国刚 (328)
- 书简片断 也见丹心
- 从冬铃的来信看冬铃 施善昌 (333)
- 高时显与丁辅之
- 《四部备要》辑校、监造人考 卞孝萱 (337)

- 中华书局九十周年大庆有感 俞筱尧 (347)
- 干校记什 黄葵 (352)

附录:

- 郑重推荐《陆费逵与中华书局》 王益 (367)
- 《陆费逵与中华书局》编后 俞筱尧 刘彦捷 (372)
- 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 俞筱尧 (375)
- 改造 定位 创业
- 记1950—1965年的中华书局 谢方 (380)
- 建国五十年中华书局的古籍出版成就 王育红 (395)

我与中华书局

张岱年

我和中华书局曾经有密切的联系。197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和中华书局组织了两个编写组，一个是《论语批注》小组，一个是《荀子新注》小组。这两个小组我都参加了。《论语批注》小组，由黄楠森同志任召集人，参加的有李世繁、朱伯崑、魏英敏同志等，对于《论语》各章进行注释、今译及批判。其中注译部分参考了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加以修改，批判部分则运用新的观点进行批判，在当时的气氛之下，以过左的观点进行批判，难免有过当之处。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批注》写成了，正式出版了。但是“批孔”的高潮已过，也就无人看了。

当时认为荀子是法家，加以表扬，参照《荀子集解》撰写“新注”，要用新的观点加以注释。参加《荀子新注》有楼宇烈、马绍孟同志等。当时计划编写新注，要超过《荀子集

解》的水平，有了《荀子新注》，就可以不看《荀子集解》了。事实上，《荀子集解》详细抄录了清儒的有关考证，还是必须参阅的。《荀子新注》写成，由中华书局出版。

为了《论语批注》和《荀子新注》的编写，我在中华书局住了两个月。那时中华书局在王府井大街文联大楼，处在繁华大街上，街道整齐，交通方便，当时我六十多岁，身体尚好，参加繁重工作，不觉劳累。在中华书局住的两个月，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1972年，领导指示“要学点中国哲学史”。于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决定编写一本“中国哲学史”教科书，由冯友兰、张岱年、朱伯崑、楼宇烈、许抗生等参加撰写。我负责撰写宋元明清哲学部分。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写成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也是我与中华书局联系的一段因缘。

1978年，北京大学开始招收中国哲学史的硕士研究生，我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生开了两门课，一门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一门是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我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提纲加以整理，撰成《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后来又再版一次。这也是我和中华书局的联系中值得纪念的事情。

上世纪的70年代，我和中华书局联系较多。当时我六十多岁，现在我九十多岁了，回忆往日和中华书局的友谊，颇感到十分温暖！我和中华书局的友谊，是历久常存的。

2001年10月29日

我与中华书局之间的奇缘

王树民

中华书局要庆 90 大寿了，屈指一算，我和中华书局发生联系竟有 80 多年。1919 年，在保定读小学，所用的课本就是中华书局编印的《小学校新国文教科书》，开头几课的课文是：“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一边是图，一边是字。到自己能够看故事书时，最喜欢看的是中华书局发行黎锦晖编的《小朋友》，一周一期，每期不误。黎锦晖是位音乐家，他编的《月明之夜》、《葡萄仙子》等儿童歌剧，都在《小朋友》上连载发表。到中学时，这些歌剧常常上演，我是琴师，每次都随场伴奏。大学毕业后，在中学讲授国文和历史、地理，一部分教材选自中华书局的教科书。

新中国成立后，我在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古代史组任教。60 年代初，整理古籍的呼声响起，具体事务由中华

书局总管，发出拟定整理的书目，其中有历代纪事本末一项，历史系古代史组的同志们看中了宋、元、明三部纪事本末，由我代表全组和中华书局联系，赵守俨同志接待了我，经说明点校的原则计划要点后，当即拍板决定，这三部书归我们点校。那时流行办“红专大学”，其实就是培训班的性质，北京图书馆办了一个，为图书馆、出版社和新华书店的从业人员讲授古籍常识，采用我在学校的《历史要籍介绍》讲稿为教材，油印成册。有几位中华书局的同志参加“红大”，他们拿的教材，被总经理金灿然同志看到了，他肯定了这部教材，后来和我会面时，表示希望能整理好，由中华书局印行。十年动乱过后，此稿改定为《史部要籍解题》，正式与世人见面，可惜已无法与灿然同志见面了！在点校古籍和整理讲稿时，我还做着《廿二史札记校证》。1966年中，《宋史纪事本末》将发稿排版，其他工作也顺利进行，忽然急风暴雨的“文化大革命”袭来了，我从事的工作都是属于“四旧”一类的，自然见不得天日，于是早日收起来，避免了回禄之灾。中华书局也闹起了革命，改名为中国文化出版社，“文革”前本已组织力量点校“二十四”史，运动一来，工作暂停，后来奉到指示，要继续这项工作。我被调来参加点校《宋史》，同组调来的有邓广铭、陈乐素、高亨等先生，加上书局原来以徐调孚同志为组长的文学组同志。过了一年左右，《宋史》组迁到上海，书稿全带去，后来书印成时，在北京这阶段的工作，埋没不提，参加工作的人成为“无名英雄”了。现在邓、陈、高、徐等几位先生已先后作古，今日思之，弥觉惘然！

那时中华书局设在翠微路一座大楼中，从各单位调来的人住在西北面一座宿舍楼中。有一天回宿舍时，几个孩子拦住楼门跳猴皮筋，唐长孺先生走在前面，要小孩子让开路，其中一个孩子瞪

了唐先生一眼，说：“你又放毒呀！”“文化大革命”的“功效”，果然“立竿见影”了。

当时运动虽然闹得轰轰烈烈，资料室的书，在内部还可以照常借阅，我便借来，在晚上看。在那个动乱的时期中，我倒有机会看了一些在外间不易看到的书，也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

十年动乱过去后，《宋史纪事本末》首先印成出版，当时一切工作强调集体，这书虽然主要是我作的，但只能说是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组，过了一年多，《元史纪事本末》成书，允许在《前言》中集体组织的名下，加上个人的姓名，这也表明了一种事情发展的轨迹。在其后的几年中，我编写和点校的书，陆续由中华书局印行：1981年11月，出版了《史部要籍解题》，到现在已经印了三版。1984年1月，出版了《廿二史札记校证》，2001年11月再版时，增加了《订补》。1986年2月，出版了编校的《戴名世集》。1995年11月，出版了点校的《通志二十略》。1997年8月，出版了《曙庵文史杂著》。1997年9月，出版了《中国史学史纲要》，2000年12月再版。正在印刷中的有二种，都是与他人合作的，一是编校的《戴名世遗文集》，一是点校的《国语集解》，不久就可与读者见面了。单篇短文发表在中华主办的刊物《文史》、《文史知识》、《书品》等，不下数十篇。我的学术工作，如果没有中华书局的支持，将是不可想像的，用一句旧话来说，总算是有缘吧。

2002年2月16日，于北京和平里寓庐

我与中华书局的深情厚谊

吴小如

中华书局从创办至今九十年了，我自己也居然活了八十岁。说来难得，我和中华书局的友情真称得起源远流长，竟在七十年以上。这不是虚夸不实的大话，而是确凿有据的实情。

记得我是虚龄四岁开始识字的。启蒙的课本不是《三字经》、《千字文》，也不是从“人、手、足、刀、尺”开宗明义的小学教科书（那到我入小学时才开始接触它），而是当时中华书局一册又一册陆续出版的《中华故事》。印象中它是红皮封面，薄薄一本，内用油光纸石印，有文有图，文字是用文言文撰写的。好像我并不是从第一册开始顺序读下去，而是从书店中买到哪一本就读哪一本。母亲用了好长时间才买足一整套，而一套共有多少册现在已完全记不得了。只依稀记得在我过十岁生日（所谓“整生

日”)时家中这一套已残缺不全,母亲很想买一套新的给我作生日礼物,却已配不齐了。直到1936年我上南开中学,父亲有一次同我闲谈,认为给孩子启蒙,最好的读物还应推《中华故事》。可惜当时此书早已绝迹。而家中原有的残书,则因1932年从东北迁返北平时被抛弃了。

《中华故事》靠祖母和母亲讲解才能懂,文言文是无法无师自通的。有时遇到难讲句子或难认的字,则要请教父亲。一般儿童都熟悉的故事如曹冲称象、司马光打破水缸救伙伴等都是从《中华故事》上读到的。我还记得一个故事是说文彦博用水灌树洞,让落入深坑中的球(书上写的还是从“毛”、“求”声的那个字)浮出水面。而印象最深的是说东汉老将马援(这个“援”字用作人名是应读去声的)“据鞍顾盼”,汉光武帝称他:“矍铄哉是翁也!”后来读《后汉书·马援传》,才发现儿时所读原是《马援传》的本文,难怪父亲对这一套《中华故事》评价甚高了。现在回想,这部书的不足之处是每个故事缺乏连贯性,不容易学到系统的文史知识。如果中华书局还保存着近百年的出版档案,我想是有可能追踪出这套启蒙读物的下落的。

在我读小学时,我曾连续几年把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小朋友》当做“课外必读书”。现在只记得这套杂志主编者名吴翰云,撰稿人中有陈伯吹。当时除《小朋友》外,商务印书馆也出版了一套少儿杂志名《儿童世界》,我曾读过几本。但我对《小朋友》情有独钟,后来对别的少儿读物就不大爱看了。这个杂志有一专栏名曰“儿童创作栏”。我当时在哈尔滨市第十七小学读书,曾写过一篇短文直接寄给吴翰云先生。承他回信,告以那篇习作将在《小朋友》某期“儿童创作栏”中发表。寄稿时“九·一八”事变尚未发生,

到我的那篇处女作刊出时已在东北版图变色之后，因此哈尔滨彼时已看不到《小朋友》了。直到1935年，我在北平育英小学（我是从那个学校毕业的）的图书室里，才翻到尘封已久的《小朋友》合订本，亲眼“欣赏”到我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大作”。转眼又是六十多年，这一套合订本《小朋友》是否尚在人间，也颇令人牵挂呢！

从读中学到上大学，我所寓目的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古今图书，确有不少精品，堪称“不朽”之作。仅“大学用书”中就有好几部至今犹难忘怀。如刘大杰最早的一版《中国文学发展史》和骆鸿凯的《文选学》等，都极为难得。40年代我在北大中文系肄业，有一次沈从文师同我闲谈，提到刘大杰的《魏晋思想论》不可不读，我便立时买了一本，一气读完，至今尚存敝篋。50年代初因备课讲明代文学史，在当时中文系资料室中找到一本李文治著的《晚明民变》，迄今我认为这是一本足供治明末农民起义者使用的最佳钥匙。上述两种，都是由中华书局出版，却很少为人注意的好书。至于最适用、最方便的《四部备要》，长期有使用价值的旧本《辞海》，乃中华书局功在千秋的铁证，人所共知，这里就无须我再来饶舌了。

进入60年代，我和中华书局缘分最深的是几种定期或不定期的刊物。“文革”前的《文史》，从第二辑起我就在上面发表文章。十年浩劫后，自1980至1981年，我还为《文史》义务组稿，并编发过有关文学方面的论文，共四辑。其中俞平伯、林庚、罗尔纲诸先生的大著，都曾经我手审读发表。《学林漫录》创刊，我一直是忠实读者和热心撰稿人。在前十辑中，我曾连续发表了自以为还有点水平的《京剧老生流派发展综说》。后来局方还为我出版了单行本。我的一些书评、书话在《书品》上也不时充数。特别是《文史知识》，自它问世以来，除掉中间有短暂空缺没有联系之外，绝大部分时间